

刘德重 张寅彭 著

诗话概说

修订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

刘德重
张寅彭 著

诗话概说

shihua gaishuo

(修订版)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话概说 / 刘德重, 张寅彭著.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36-5192-3

I. 诗… II. ①刘…②张… III. 诗话—文学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0650 号

责任编辑: 王 骏

装帧设计: 许海波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50 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38.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3683078

目 录

MULU

第一章 诗话总说 / 3

- 第一节 诗话的得名 / 3
- 第二节 诗话的范畴 / 5
- 第三节 诗话的渊源 / 10
- 第四节 诗话的分类 / 18
- 第五节 诗话的价值 / 26

第二章 宋诗话 / 34

- 第一节 诗话的产生与早期诗话 / 35
- 第二节 苏、黄诗风与北宋后期诗话 / 42
- 第三节 江西诗说的发展与南宋前期诗话 / 59
- 第四节 《沧浪诗话》与南宋后期诗话 / 86
- 第五节 宋代的诗话汇编 / 101

第三章 金元诗话 / 119

- 第一节 金代诗坛与《溁南诗话》 / 119
- 第二节 元代诗话 / 124

第四章 明诗话 / 140

- 第一节 明初至明中叶诗话 / 141
-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前期的诗话 / 158
- 第三节 晚明诗话 / 194
- 第四节 明代的诗话汇编与诗话丛书 / 215

第五章 清诗话 / 228

- 第一节 唐宋诗之争中的清初诗话 / 229
- 第二节 康熙、雍正时期诗话 / 251
- 第三节 集古典诗学大成的乾隆、嘉庆时期诗话 / 272
- 第四节 晚清暨近代诗话 / 296
- 第五节 清代的诗话汇编与诗话丛书 / 317

[附录] 历代诗话书目 / 331

初版后记 / 359

修订后记 / 361

诗话概说

SHEN LAI WU

第一章 诗话总说

诗话是我国古代诗学著作所特有的形态，它是一种以笔记体为基本形式，具有理论批评性质、记事杂录性质或讲说诗法性质的诗学著作。诗话正式产生于宋代，在宋以后的诗歌发展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古代的诗话著作是相当丰富的，据我们所知，不包括已散佚者，仅流传至今的就有一千多种。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诗学遗产。对古代诗话加以整理和研究，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也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节 诗话的得名

“诗话”这一名称，应当说是欧阳修的原创。

前辈学者郭绍虞先生曾多次强调过这一点：

诗话之得称，始于欧阳修《六一诗话》。

（《照隅楼杂著·诗话丛话》）

诗话之称，当始于欧阳修；诗话之体，也创自欧阳修。

（《宋诗话辑佚·序》）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原本就题作《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它不仅首标“诗话”之名，而且也开创了“诗话”之体。

“诗话”，顾名思义，就是关于“诗”的“话”。据欧阳修自己说，他写这部关于“诗”的“话”，是用来“资闲谈”的：

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

（《六一诗话·小序》）

这里所说的“闲谈”，是当时士大夫中间颇为流行的一种风气。士大夫“闲谈”的话题，自然可以是多方面的，而谈有关诗的内容，则是“闲谈”中会经常涉及的一个话题。欧阳修退休以后，比较空闲了，便把以往自己亲历或耳闻的有关诗或诗人的逸闻佚事，也包括自己关于写诗、论诗的一些看法，用笔记的形式一条一条记录下来，“集”在一起，以供“闲谈”时所用。就在这不经意之中，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话著作便自然而然地应运而生。作为一部著作，需要起个名字，而“诗话”二字，就是一个最贴切而又最现成的名字。这个名字，正好说明它是“闲谈”的产物。其中的“诗”字，概括了“闲谈”的内容，而“话”字就是“闲谈”的“话”，合起来便是指“闲谈”中有关“诗”的“话”。“闲谈”的“话”，自然可以是很随意的，漫谈式的，这又决定了记录这些“话”的形式，也可以是一条一条的，随笔式的，“诗话体”（即用以谈诗的笔记体）就是这样诞生的。可见，欧阳修给自己的这部著作起名为《诗话》，跟这部著作的写作缘起以及内容和形式，都是相切合的。“诗话”的得名，原是很自然的事。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话”的得名及“诗话体”的形成，可能与当时民间流行的“说话”、“话本”有关。所举理由，一是认为“说话”的“话”与“诗话”的“话”都是“故事”的意思，后者可能本自前者；二是认为“话本”中也有题作“诗话”的，欧阳修可能受其“启发”；三是认为许多文体大都发源于民间，“诗话体”也不例外。对此，有必要稍加辨析。

所谓“说话”，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犹如后世的“说书”；其文字底本，称为“话本”。这里的“话”字，确实是“故事”的意思。而欧阳修“诗话”的“话”字，则是指文人“闲谈”的“话”；只要与“诗”有关，什么“话”都可以谈，当然包括谈诗的“故事”，但并不限于“故事”。而且“诗话”中所谈的“故事”，主要是记述有关诗或诗人的逸闻佚事，与民间“说话”有头有尾地讲唱故事也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话本”而题作“诗话”，今存仅《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据研究者考证，其产生年代当

在欧阳修之后，因而欧阳修不可能受到它的“启发”。而且，它所谓“诗话”，是有“诗”有“话”、夹“诗”夹“话”的意思，“诗话”二字是一个并列结构的词语；而欧阳修命名的“诗话”二字则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语，“诗”是“话”的限制词。二者字面虽同，而含义迥异；其内容、体裁也迥然不同，不存在什么继承关系。其实还可以反过来推测，如果知道民间已有“诗话”之称流行，而所称与自己的著作又完全不同，按照常理，反倒是不会去起一个字面相同、容易引起误解的名称的。其三，从文体的发展来看，从民歌发展到文人诗，从民间曲子词发展到文人词，从民间地方戏曲发展到文人创作的杂剧、传奇，从民间话本发展到文人创作的古典通俗小说，这都是公认的事实。而说从“民间诗话”发展到“文人诗话”，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两个“诗话”概念并不相同。所谓“民间诗话”，其实就是“话本”，它与“文人诗话”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话本”是古典通俗小说的源头，而不是“文人诗话”的源头。“文人诗话”采用的文体“诗话体”，不是来自“话本”，而是来自笔记体。从文体发展的线索来看，说“文人诗话”是由“民间诗话”（“话本”）发展而来的，是望文生义地把两种不同的文体扯在一起了。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

这里，不妨作个类比：宋代的江西诗派好考究诗句来历，有所谓“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优古堂诗话〉提要》曾经指出：

夫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暗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于求剑刻舟。

欧阳修以《诗话》名书，民间有一种话本也题作“诗话”，当亦属于“无心暗合”。况且“诗”、“话”二字，原系常用之字，“诗话”一词，亦非难想之词；必求其源出某某，亦未免求之过深、失之过凿了。

第二节 诗话的范畴

欧阳修的《诗话》，原是以“闲谈”为宗旨的，因而其中有不少记述逸

闻佚事的成分,稍后的司马光写《续诗话》,也沿着欧阳修的路子,并在小序中将他们这两部诗话著作概括为“记事一也”。这种“闲谈”、“记事”性质的诗话,虽然也蕴含着作者的诗学见解,但较之严肃的诗学理论批评著作,其内容要随意得多,形式要灵便得多。“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有诙谐的成分。”(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这正是“闲谈”、“记事”类诗话的一个显著特色。

诗话这种内容上的随意性和形式上的灵便性,“为论诗开了个方便法门”(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使得撰写诗话成为人尽可能之事,因而它一经产生,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俨然蔚为诗学著作之大宗。诗话的发展轨迹,大抵有两个方向:一是延续着“闲谈”、“记事”的传统本色而又有所扩展,这突出地表现在“记事”的目的和范围上,不再囿于“以资闲谈”的逸闻佚事,而是为了保存、流传诗学文献,有意识地搜集资料,记述见闻,撰写成诗话著作。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纪事”类、评传类著作就这样进入了诗话的领域。二是突破了“闲谈”、“记事”的限制,朝着理论批评的方向演进,使得诸如诗论、诗评、诗格、诗法、诗体、诗派、诗考、诗谱等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著作也都相继纳入了诗话的范畴。较之前一类“闲谈”、“记事”性质的诗话,这一类诗论、诗评性质的诗话更为人所重视,因为它们提升了诗话的诗学层次,使诗话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殿堂。正是在这种发展和演进中,诗话的内容越来越宽泛,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

由于诗话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没有严格的规定性,因而它的外延往往不容易确定。清代学者章学诚就曾指出,作为集部诗文评类的诗话,既可以“通于史部之传记”,又可以“通于经部之小学”,还可以“通于子部之杂家”(《文史通义·诗话》)。这种相通,正说明诗话的界限是不那么分明的。因此,有必要对诗话的范畴作一个大致的界定。

首先,从时限上来看,诗话始于宋代。但在宋代以前,诗评、诗格、诗句图、本事诗等类型的著作已经出现了,古人把这些著作也视为诗话。如明代的胡应麟在《诗薮》中开列了“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二十种,并强调说:“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者,非也。”稍后胡震亨在《唐

音癸签》中也列有“唐人诗话”之目，著录唐人著作二十八种。至清代何文焕编《历代诗话》丛书，更以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列为开卷之首，以至今人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也随之称“《诗品》是我国‘诗话’的最早一部作品”。对此，周振甫先生在《中国历代诗话选·序》中曾指出：

欧阳修和司马光的诗话，引起读者注意的，是在他们论诗的部分。这样，诗话的重心就从讲诗的故事转到诗论，从说部转到诗评，转到文学论和美学论了。到了严羽著《沧浪诗话》，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考证》），完全论诗，不再讲故事了。这样，钟嵘的《诗品》和其他论诗的书，像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等都可归入诗话了。

这说明，宋代以前的一些诗学著作是在诗话的范畴不断扩展之后而被人们类推、追认的，它们可以说是在诗话产生以前尚无其名而先得其实的诗学著作。从一般意义上说，把宋代以前的这些著作统称之为“诗话”，固然也无不可；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诗话，与宋代以后的诗话著作应有所区分。正如郭绍虞《清诗话·前言》所说：

诗话之体，顾名思义，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著作。溯其渊源所自，可以远推到钟嵘的《诗品》，甚至推到《诗三百篇》或孔、孟论诗的片言只语。但是严格地讲，又只能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为最早的著作。

这便涉及到诗话范畴的广狭二义。郭绍虞在他早年撰写的《诗话丛话》中就已指出：“诗话有广狭二义”，“论诗话之得称，始于欧阳修《六一诗话》”，“诗话之体，肇自欧阳”，“故由诗话之得称言，则当主于狭义”；“章学诚谓‘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所以论其滥觞所始，本不主于狭义”，“论其流别所滋，更不限于狭义”。郭绍虞主张分别使用诗话的广狭二义，是十分正确和通达的。这一观点，也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所

以本书论述诗话,其上限即自欧阳修始,至于此前的诗学著作,则视为诗话的渊源。

其次,从内容上看,诗话当以谈诗为主。有些诗话著作也谈及词、曲、赋、文、四六等文体,但大多是旁涉,并不妨碍其诗话性质。倘以谈词、曲、赋、文、四六等文体为主,则不属于诗话范畴,而应属于后来衍生的词话、曲话、赋话、文话、四六话等范畴了。有些著作比较特殊,如元代王构的《修辞鉴衡》,上卷论诗,下卷论文,可视为诗话与文话的合集。宋末周密的《浩然斋雅谈》,以文话为上卷,诗话为中卷,词话为下卷,则是三者的合集。其中中卷部分,也可视为是周密的诗话著作。后来日人梁川星岩、菅老山即将其辑出,题作《浩然斋诗话》刊行;日人近藤元粹又将其刊入《萤雪轩丛书》,改称《弁阳诗话》,这一部分遂成为单行的诗话著作。

诗话与笔记,诗话与总集,有时也在两可之间,难以分清。其实,诗话本来就是一种谈诗的笔记,所以笔记中谈诗的成分多了,便可以称为诗话。例如宋释惠洪的《冷斋夜话》,《四库全书总目》把它作为笔记归入子部杂家类,但其《提要》又说:“是书杂记见闻,而论诗者居十之八。”既然书中内容十分之八都是谈诗,自然也可以归入诗话。诗话与总集也是如此。例如宋末蔡正孙的《诗林广记》,《四库全书总目·〈诗林广记〉提要》称其“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然此书凡无所评论考证者,即不空录其诗”。所谓“不空录其诗”,即不录无“话”之诗,可见其重在以诗证“话”,故《四库全书总目》将其视为诗话,归之于集部诗文评类。而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虽然书中也有不少论诗评诗之语,但其着眼点重在选诗,故其性质自当属于总集。后世有些诗话,有时也会有诗多话少的现象,清代张麟年在《一虱室诗话》中曾对此提出批评:

何为诗话?人以诗,吾以话;以吾之话,解人之诗,所重在话,诗次焉。近人好作诗话,往往诗多多许,话少少许。取长篇大简堆叠其中,首尾加几句诗话套语,而诗话能事毕矣。果诗话邪?乃诗录也,话何有焉!是故作诗话者,诗宜居少数,话宜居多数。

此所谓“所重在话，诗次焉”，“诗宜居少数，话宜居多数”，即道出了诗话与总集的区别。

诗话与总集类交叉的情况还有很多，与传记类也有交叉。如《四库全书总目》归于集部总集类的《文选句图》（亦作《选诗句图》，宋高似孙）、《诗学权舆》（明黄溥）、《诗女史》（明田艺蘅），归于史部传记类的《唐才子传》（元辛方房）等，其实也都可以为诗话范畴所包容。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诗话所谈之诗，当然可以涉及《诗经》、《楚辞》，但诗话又有别于专谈《诗经》、《楚辞》的著作。这是因为《诗经》、《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特殊，对它们的研究已经成为专门之学，所以专谈《诗经》或《楚辞》的著作，通常被纳入“诗经学”或“楚辞学”的范畴，而不划归于诗话领域。

其三，从存在形态来看，诗话应当是一种独立的著作。所谓独立的著作，并不是一定要刻成单行本。收入诗话丛书或其他丛书，也是独立著作的一种存在形态。有些诗话，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著作存在于著者的别集或杂著中。这里需要区分的是那些本来不是诗话、在辑入丛书后才被视为诗话的那些著作。例如明代顾起纶所编明诗总集《国雅》二十卷，卷首列有“品目”一卷，原不是诗话，后来被辑入《历代诗话续编》，题作《国雅品》，便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诗话著作了。像这样辑成的诗话还有很多，对它们在辑出前和辑出后，是应当分别视之的。

最后，附带说一说关于白话诗的新诗话问题。我们所说的诗话，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传统诗学的一种著述形式。它的存在是与传统旧体诗的写作和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我国文学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发展史来看，上个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新文学运动，将我国文学分成了古代（含近代）文学和现代（含当代）文学两个时期。在这以后，白话新体诗已逐渐取代了文言旧体诗。尽管旧体诗的写作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但在现代文坛上毕竟已不占重要地位。现代诗论与传统诗论固然有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是两个系统。因此，今人撰写的诗话，也可以根据其研究对象和表达方式，分属这两个系统。例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钟仲联先生的《梦苕庵诗话》、《清诗纪事》，都是以古代旧体诗为研

究对象的，在表述上也大体采用文言及传统方式，它们与古代诗话的统绪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本书论述诗话的下限拟定于清末，故民国以后的诗话未予论及。至于那些以现代白话新诗为谈论对象的新诗话，只是借用传统诗话之名，已无传统诗话之实，它们实际上应当属于现代诗论，而不应再纳入传统诗话的范畴。

第三节 诗话的渊源

诗话的内容既然有“闲谈”、“记事”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诗话的形式诗话体又来自笔记体，因而推溯诗话的渊源，也就有这样两条线索：一是前代诗歌理论批评对它的影响，一是前代记事笔记对它的影响。

我国诗歌理论批评的发端，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虽然还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但散见于一些典籍中的论诗、评诗、谈诗之语，已经带有理论批评的性质。因此，前人溯及诗话的渊源，往往把它们看作是最早的源头。如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

诗话于何昉乎？虞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

姜曾在《三家诗话·序》中说：

吴札观乐，不废美讥；子夏序诗，并论哀乐：即诗话之滥觞也。

秦大士在《龙性堂诗话·序》中说：

诗话之由来尚矣。“思无邪”，孔子之诗话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之诗话也。

曾燠在《静志居诗话·序》中说：

诗话何昉乎？孟子之论《小弁》、《凯风》与《云汉》之诗，盖诗话之祖也。

所谓“赓歌”，是指《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赓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旧说此序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其实是出自汉儒之手。所谓“《春秋》赋答”，是指《春秋左氏传》中所记当时外交场合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记述诗事这一点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所谓“吴札观乐”，是指《春秋左氏传》中所记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并对乐工演奏《诗经》各部分所作的品评，这是对《诗经》最早的评论。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孔、孟的论诗意见。孔子的“思无邪”说（见《论语·为政》），提出了评价诗歌思想内容的标准。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说（见《孟子·万章上》），指出了阅读、鉴赏诗歌的方法。孔子、孟子还对《诗经》中的一些具体作品进行过评论或阐释。这些，都对后世的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所采用的语录式文体和以三言两语发表诗学见解的方式，也与后世诗话不无相通之处。

然而，先秦的诗论，毕竟还只是零章碎简；到了汉代，才出现了《离骚传》、《毛诗序》那样的专门论诗、解诗的著作。因此，又有人把诗话的渊源溯至汉代。如清代陆圻在为毛先舒《诗辩坻》所作的序中说：

然则辩诗者何昉乎？语有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辩之始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评论《诗经》的话。不过此传早佚，仅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尚存一斑。汉代最重要的诗学著作当推前已述及的《毛诗序》。此序有大、小之分，前引何文焕、姜曾所说的是《大序》，清汪沅在为杭世骏《榕城诗话》所作的序中则认为诗话源出于《小序》：

予惟诗话之作，滥觞于卜氏（子夏）《小序》，至钟仲伟（嵘）《诗品》出，更一变其体。

钟骏声在《养自然斋诗话·自序》中也说：

诗话权舆于《小序》，滥觞于《韩诗外传》，其名则始于宋。

《小序》是对《诗经》中一首首诗歌主旨及背景的解说，颇类似后世所说的诗歌本事。日人青木正儿说，《大序》“论风、雅、颂之义”，属于“体论之例”；《小序》记“作品之由来”，属于“故实之例”。这正与后世诗话论评和记事两种倾向相合。

毫无疑问，先秦两汉的诗论对话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还比较间接，很难一一实指。与诗话关系更密切的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出现的一些诗学专著和笔记小说，它们从理论批评和记事体制两方面都为诗话的产生直接开拓了道路。所以又有人认为诗话始于“六朝”。如孙均《灵芬馆诗话·序》称：

诗话之作，昉于六朝，衍于唐，盛于宋，流波及于元、明。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理论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的品评，陆机在《文赋》中对艺术构思规律的描述，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各种文体特点、源流的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学理论全面、系统的阐发，钟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专门研究，都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值得提出来说的，是钟嵘的《诗品》。

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南齐永明中为国子生，举州秀才，任南康王侍郎。梁天监中，任晋安王萧纲记室，世称钟记室。其《诗品》或作《诗评》，当成于天监十二年（513）以后。全书三卷，专论五言诗，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卷首、卷上末、卷中